



台湾中国古代文学 研究文选

卢兴基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台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选

卢兴基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台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选
Taiwan Zhongguo Gudai Wenzue
Yanjiu Wen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35,000 开本850×116.毫米 $\frac{1}{32}$ 印张15 插页2

1988年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60

ISBN 7-02-000189-0/I·190
书号 10019·4202 定价 3.10 元

前　　言

卢兴基

收录在这个论文集中的二十八篇论文，都是从台湾省的文学专门刊物、大学学报和有关学术专著中选出来的。刊出的时间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八五年止，凡三十年。实际它反映的时间跨度包括了三十余年的一个独特时期。三十余年中，我们的国家由于海峡的阻隔，本应为一支统一的研究队伍而分隔在两岸，学术上未能及时交流，互相切磋，互相促进，共同来发扬我中华文化的固有遗产。这一局面的形成，当然是很不正常的，抚今思昔，不免令人感慨。

这个集子，不能说已代表了台湾地区古代文学研究的全面成果，当然也不能断定是整个地区的最高成就，因为大陆关于这方面资料还不完备，兼之选稿总有个人的眼光和水平的限制，要做到在纤毫不遗地加以精选，事实上是有困难的，但至少可以从中窥见台湾的同行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可喜收获，以及论者的眼光和研究的特点。台湾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是我国学术研究的共同财富，弥足珍贵。鉴于广大古代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切望了解这部分成果，因而先编出一个选集以弥补不足于万一，这是出版社和编者本人编辑此书的初衷。

当前，我们的国家已经步入一个开放性的新时期，那种不同程度存在的封闭的、单一模式的研究方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

们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要求，一些传统的思辨形式和观念要重新加以检讨，一些原来视为不变的成说和结论需要进一步检验，迫使我们急切需要在坚持古代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扩展我们的视野和思维空间，以丰富我们的真正切合于文学艺术特点和它的自身发展规律的文艺理论体系，促进古代文学的研究更上一层楼。从这一点出发，台湾地区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应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编者希望这部论集多少起到这样的作用。

下面容我对这二十多篇论文作一点概括的介绍和说明。为了引文的方便，介绍和说明时略加分类：

一，偏重于音韵、训诂和考据学方法的，有李辰冬的《从婚姻关系试解六首〈诗经〉》等文。李文阐释《诗经》中“婚”、“姻”二字的本义，结论是举凡三百篇中“婚姻”、“旧姻”、“姻亚”等词，都是“男女双方家长的称谓”，因而一系列的诗都获得了新义。杨允元的《为陆放翁辨正》是为纠正在美国出版的两部关于陆游的专著对“放翁”一义的误解而写的论文：一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特逊 (Burton Watson) 所著《The Old Man Who Does as He Pleases》；另一部是陆游作品的选译，书名即称作《Lu You》(陆游)，译者为杜克(Michael S. Duke)。前者的书名直译即“随心所欲的老人”。由于这一误解，于是出现了一些乖违史实的论述。作者依据史料及考证，澄清事实，辨证误说。

近代敦煌学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敦煌资料散藏于海内外，有些学者未必都能“目验手摩”，致使许多写卷存在着误解与误读。李殿魁《谈敦煌写卷的解读与通俗文学的研究》从四个方面提出问题：1，旁证资料的解读错误影响主题研究的判断；2，由于不能细读原卷而失之臆测；3，缺乏对敦煌卷子的书写习

惯和抄写习惯的了解而产生误会；4，注意现有《敦煌遗书总目》等遗佚的资料的继续发掘。作者通过亲历巴黎国家图书馆某些原件的参读，搞清了诸如“唱衣历”等历来解读的错误。

二，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台湾古典文学刊物多有一些被我们忽视的作品或问题的研究，从中往往可以见微而知著，或说明某种文学现象，或具有文艺学和美学上的典型意义。

叶庆炳文就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对“鬼”的描写作了一个概括，发现它们有许多有趣的共同点，如一致申明“鬼”是确实存在的，并有特异于人类的本领，女鬼的爱情都有“三部曲”，也会生病挨饿，善于恶作剧等，研究这些“鬼”，其实就是研究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特征。

《惊识杜秋娘》这样的题目就很少见于大陆的论文。它的内容大部分是杜秋生平的勾稽考定，但文笔清丽，富有感情。杜秋一生，十五嫁为李锜妾，李锜于宪宗元和二年（807）叛唐随又伏诛以后，她被迫入宫，经历了“四朝三十岁，似梦复疑非”的生活，在封建社会里是颇为值得同情的女性，因而杜牧的《杜秋娘诗》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之后得以流传。文章从知人论世入手，考证杜秋的生平，并欲证明在台湾极有影响的西方“新批评”派主张（详见后叙）的偏颇。

此外，还可以举出胡万川的《从〈智囊〉、〈智囊补〉看冯梦龙》，郑骞的《从元曲四弊说到张养浩的〈云庄乐府〉》，罗锦堂的《〈女贞观〉与〈玉簪记〉》，姚壘《〈金批西厢记〉读后》和孙克宽的《朱竹垞词与诗略论》诸文，都是富有创见的论作。所论对象往往是我们所不经意而文学史研究却是不可或缺的。

郑骞的文章中说的“元曲四弊”就是颓废、鄙陋、荒唐与纤佻。这一概括，容或可以商榷，但他推崇张养浩的《云庄乐府》独

为“清丽豪放兼而有之”，既无颓废、鄙陋，又不沾染荒唐、纤佻，兼擅清丽与豪放两派之美，却是肯定备至的。

罗锦堂文从《玉簪记》的版本到《女贞观》的情节考索，进而以《玉》剧与《西厢记》作比较研究及渊源的研究，功夫颇扎实。

姚垚的《〈金批西厢记〉读后》是属于对评点派大家金圣叹的文艺思想的研究。作者肯定他在艺术上的卓识和思想的进步倾向，也概括地指出他的几个缺点。金圣叹可谓明清之际的文坛怪杰，过去大陆学界为某些成见所掣肘，难以对他作切实的研究，近几年来有了突破。现在来看看台湾同行的评价，是不无启发的。

孙克宽文是作者的一篇长文的压缩。朱彝尊为清初文学大家，诗、词、古文都有成就和影响。但作者从他的词与诗的论析出发，认为词的方面，作为浙派的开山，他力反当时崇尚的“花庵草堂之吟”而“独开风气，提倡清绮密缛的南宋体”，其创作豪放不羁而又出之以蕴藉，吞吐不尽，能损益豪放婉约之间。他的诗，在康熙中叶，和王渔洋抗衡坛坫，直至雍乾之际，还播在人口。艺术上，主要以唐为宗，但也常常以“学问为诗”，网罗典故，锻炼篇章，只是因为他“才高神足”，才能运用灵活，不为所累。清代为古典文学的总结时期，各方面都有所体现，成就也是很突出的。要了解这一时期文学的成就与得失，需要对于象朱彝尊这样的代表人物进行深入的剖析。

邱燮友的《唐诗中的禅趣》、吴颐平的《陶靖节与慧远》、苏文擢的《柳宗元与佛教之关系》等文，是古代文学和作家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元遗山说：“诗为禅家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答俊书记学诗》），说出了中国诗与禅宗哲学的密切关系。严羽甚至认为“论诗如论禅”（《沧浪诗话》），不懂得用禅宗哲学这把“切

玉刀”去论中国的古诗，往往不能深切其中的奥义。邱燮友文专就唐诗之禅趣进行探讨，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说是古诗赏析入门之必需。另二文中，吴颐平文从资料出发，考证陶渊明与净土宗初祖慧远的交往与思想的离合；苏文擢文则阐幽发微，辨明柳宗元受佛教影响的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问题。佛教东渐，影响及于中国士大夫思想之深，是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而兼及佛学，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值得提倡。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文史研究中心必须有“纵通”与“横通”的两方面，是颇有见地的。

三，版本与源流的研究，是我国学者历来重视的传统。近若干年来，由于海内外学者对于《金瓶梅》的重视，它的作者、写作年代和版本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魏子云先生是台湾研究《金瓶梅》的专家，近几年来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集中考证了它的有关问题。本书所选的《因果、宿命、改写问题——〈金瓶梅〉原貌初探》是他一九八五年的近作。

大陆有学者提出《金瓶梅》一书出于明万历年间文人屠隆之手（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复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一九八二年第五期）。魏氏的看法与此相同。他还认为署有万历丁巳（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词话》，在内容和主题上与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等所见的《金瓶梅》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后者的改写本。可见于作者的《金瓶梅探源》（巨流图书公司出版）和一九七七年八月发表的《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出版与研究》第三期）、同年十一月发表的《明代的金瓶梅史料》（《中外文学》六卷六期）、一九七九年七月发表的《金瓶梅第一回》（高雄《台湾新闻报》）等文。魏氏对于反映袁宏道曾向董其昌借阅过《金瓶梅》并加以副录一事而给董

的一封信：《与董思白书》（这是最早谈到《金瓶梅》的史料），和另一封反映谢肇淛又曾向袁宏道借阅并副录的袁的索书信：《与谢在杭》，认为大有可能都是赝品（见《明代的〈金瓶梅〉史料》）。他认为即使确有其事，从而“证明《金瓶梅》早在万历二十四、五年间即流传于世，也不能证明那个本子就是今之《金瓶梅词话》。可能今之《金瓶梅》也是被改写过的。”（见《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当时支持这一“改写说”的是作者所发现的《词话》第一回的引证诗词及所叙述的故事与书中内容大相扞格，无所措置。（见《金瓶梅第一回》）但一九七九年美籍学者马幼垣公布了他得自乃弟马泰来氏从谢肇淛的《小草斋集》中发现的《金瓶梅跋》（题为《研究〈金瓶梅〉的一条新资料》，载于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所编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一集），证实了袁宏道所书二信的真实性，说明董其昌、袁宏道、谢肇淛在万历二十五年前后即已看到并拥有《金瓶梅》的部分抄本。马幼垣并认为万历四十五年丁巳距谢肇淛去世仅七年，其间“很难想象会有一书同名而内容大异者插杂其间”。但魏氏于一九八〇年写《论谢肇淛〈金瓶梅跋〉》（《中外文学》八卷六期）对此跋的真实性仍存有疑窦。同年马氏又撰《论〈金瓶梅〉谢跋书》作答（《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二集），并随文公布了谢跋的影印原件，其真实性终于得到确认。但魏氏仍坚持自己的改写说。于《金瓶梅头上的王冠》（与马文同发表在《专集》二）、《金瓶梅编年说》（《中外文学》八卷十一期）二文中在对小说第一回进一步研究后指出：1，从第一回的四阙引词和四贪词等看，它与全书内容抵牾，说明“袁中郎在万历二十四年间读到的那半部《金瓶梅》，极可能是一部有关禁掖宫闱秽淫的描述”，是“一部有关政治讽谏的说部”，其内容是针对明神宗宠幸郑贵妃及其子常洵并欲废嫡立幼的政

治事件的。2，而在《金瓶梅词话》中确实有万历、泰昌、天启改元的反映，可证《词话》绝不可能于万历朝梓行，“万历丁巳叙《金瓶梅词话》其成书年代，最早绝不会上越于天启元年”。3，从书中纪年的错讹看，“今世的这部所谓万历丁巳本《金瓶梅词话》，必定是在万历过世以后，匆匆而集体改写成的”。嗣后，魏氏又有《词曰、四贪词、眼儿媚——〈金瓶梅〉原貌探索之一》（《中外文学》十二卷十二期）发表，据第一回探索《词话》出现前的小说原貌。本书所收之一文，则是从全书中果报思想与宿命论的矛盾描写进一步论证两个本子的不同。魏氏的这一研究，角度较新，其结论可备一说。

四，有几篇文章属于专题性的综合研究：

尉天骢的《中国古代神话的精神》认为古代神话并非单纯神怪故事，“应该从其中寻求先民们在奋斗创造过程中所体认的痛苦经历”。中国古代神话代表了我国古代的民族精神。作者从纵横两方面来寻求它的美学据点：从纵的方面来说，他根据斯宾格勒（D. Spengler）的归纳：早一阶段由“物”衍化，后一阶段进而成为“力”的形象化；再由神的崇拜变异为神的嘲弄。作者运用的方法比较接近于唯物的历史观点。横的方面，作者又以埃及和希伯来古代神话作比较研究，进而去寻找我国古代神话的特殊品格。

王贵苓的《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是明代起着主导影响的文学流派和主张的研究。

关于明代文学，诚如王贵苓氏所说，近代偏重于戏曲小说的方面。这一点，大陆和台湾是相同的。明代正统诗文之衰微，许多人归结于八股科举兴盛的影响。黄宗羲说：“（明代）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明文案序》）这是明清之际学者的总结。从

艺术方面说，文学史家又认为：“古文、诗、词这些旧体文学，在过去的长时期中，经过许多天才作家的努力创作，产生了不可数计的优秀作品，无论形式、技巧、内容、风格各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成就，后来者纵有天才，也难跳出前人的范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九五八年版）王氏文章更归结为明代太监政治的高压和学术思想的贫乏二由。谈到他们的成就，王文认为，前后七子虽然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诗的方面，模拟的对象实际宽自《诗经》至唐代近体，也有“注重自我创作的一面”。部分作品，“在明清的诗坛上却不失为佳作”，原因是汉魏以前的作品数量少，进入唐代，因时代近，作家作品又多，就不容易尺尺寸寸地把握了，所以在复古的精神下还是写出了他们各自的某些韵味和情性。他认为这才是“复古的真正收获”。

五，关于文学的发展历史，本书选了邓中龙《六朝诗的演变》、郑骞《温庭筠韦庄与词的创造》和汪天成《诸宫调的兴起与衰微》等，它们分属于断代的研究和分体的研究。

《六朝诗的演变》一文的写法颇有特色，它打破一般史的叙述的体例，而以五位作家：曹植、陶潜、鲍照、谢朓、阴铿的分述来完成题目所示的任务。在繁丽竞姿，作家辈出的六朝时期选出这五位作家为代表，亦可谓别具慧心。由于他们都各有建树和特色，所以六朝文学的演变发展就显得更加醒豁明朗。他举曹植为建安文学的代表，这是史家的公认。嗣后陶渊明以抒情的散文化的白描手法出现于诗坛，足以惊世骇俗；七言诗成熟，于鲍照，而唐代近体诗的完成，谢朓和阴铿各有剖半之功。对于《文心雕龙》贬陶潜和鲍照，《诗品》列陶、鲍、谢为中品，史家多有回护之词，而邓文指出这正反映了刘勰和锺嵘的守旧精神，这是颇有见地的论断。

词的起源，众说不一，要之一出于乐府，一出于唐人之近体。近代敦煌曲子词的发现，更证实与民间的创造有莫大的关系。文人填词，始于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但疑者有之。郑骞《温庭筠韦庄与词的创造》虽然没有涉及词的早期渊源问题，但对文人词的创始，持稳健之论。郑氏说，中唐之世，词方兴盛，“但是，中唐之词实在还未脱诗的形式。当时有限的若干词调，大部分是七言或五言或六言绝句式的，或全用绝句，或稍为增减变化”，迨及温、韦，“词的面目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不仅词调增多，而且大部分是长短句并用，句数也较多。他认为这才是“真正词调”，而“不再是绝句式的非诗非词亦诗亦词的东西”。郑氏所论，实际亦是词的形式和艺术的最后完成的问题。

汪天成《诸宫调的兴起与衰微》一文，于宋、金、元三朝诸宫调的创始、演变、衰微的历史，作品和伎艺人的演唱情况逐一作了精详的考证，亦有其独到的见解。

六，文学的研究，离不开方法。在进入开放性的新时期以来，大陆许多人热心引进和借鉴西方文艺批评的方法，并移植近代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于文艺学领域。但目前尚处于理论探讨的时期，具体的收效还不明显，对于是否适应于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持怀疑和有所异议的也不少。台湾在接触西方的文化思想，吸收其文学批评的方法方面显得比较活跃。大致说来，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七十年代以前，由老一辈的研究者为主导，他们虽然也注意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不拒绝西方的美学理论，但更多的是继承传统，大陆出版的论著和资料备受重视。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新一代的研究工作者大批成长，成为学术界的一支新军而活跃在论坛上。

他们的视角有所不同，重视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移植和运用。这也是由于他们中多数在本土学成以后又留学美欧，因而兼通中西，孜孜于新理论新方法的追求，有时颇能得心应手，与老一辈的学者共同形成为不同特点和年龄层次的队伍。除了比较文学的方法以外，“新批评”派、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乃至结构主义、现象哲学、符号学等等，莫不在这新一代的学者身上引起反响。虽然，这些理论和方法，并不是新建立的批评体系，在欧美，在本世纪中的不同阶段也曾有过一个相当时期的热潮，但人们的兴趣，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移。而在东方的台湾，在一个不同文化源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却引起热烈的反应。但在理论上，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应该建立不同于西方的那种批评模式，因此在实际运用上，尝试作某种调整和补充。现在我们注意到，有的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探讨以后已经落潮或转化（如“新批评”），有的却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如文艺心理学的运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这是值得注意的。台湾研究界的这一意趣，本书因限于篇幅，只能就其中影响较大的几个方面予以反映。

文学的比较研究，在我国五四时代就早已受到注意，此后有钱锺书先生这样的蜚声中外的学者奋力开拓，作出巨大贡献。但在大陆，直至八十年代以前，并未得到普遍的持续的发展。台湾的情况不同，理论的探讨和批评的实践同时受到重视。台大《中外文学》杂志更是重要的阵地而受到海内外的好评。一九七一年在淡水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一九七四年，“中国（台湾）比较文学学会”成立。

比较文学是什么？一般认为它是跨国度、跨文化的文学作品及理论之间的研究。但有人认为这一概念仍有它的不确定性。台湾的袁鹤翔氏就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见所

撰《中外比较文学的探讨》，《中外文学》四卷三期，一九七五年八月），因为它涉及到定义、范畴和方法的不同理解的问题。在比较文学形成的早期，主要是以欧美（其实主要是欧洲）文学为核心。叶维廉氏认为，这时，各国文学的民族性虽有差异，但却同出一源——希腊文化，最后都将归结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美学假定，不同于近百年间，扩展为两三个不同文化的比较。如果在中西文化之间作比较研究，我们不应也无法用西方的既定“模子”来规范完全是另一个源流的文化体系。因此，比较文学的定义、观念、理论和“模子”的应用，都应作重新的确认。（参见载于《中外文学》和台湾《比较文学丛书》中的叶氏《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和《〈比较文学丛书〉总序》二文）这类讨论，本书因限于篇幅未予收入，仅选作品研究两篇以见一斑：

陶纬《三部〈灰栏记〉剧本比较》中提到的三部作品，即元代李行道的杂剧《灰栏记》，另两部为克拉邦德（Klabund，陶译为克拉硼）的《灰栏记》和布莱希特（B·Brecht，陶译为布雷希特）的《高加索灰栏记》。对于李著《灰栏记》，后二剧，前者可说是它的改编本，后者则是在原作的影响下写出的一部在情节和主题方面都有所不同的新作。陶氏表示文章的意图为“分别就其结构、主题、灰栏之譬喻，人物、诗与歌谣各项探讨三部作品中之异同与关系，以对这三部作品作进一步的认识”。他的工作应属于中国文学对于西方近代文学的影响的研究。条分缕析的比较，亦可见出西方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的确认。但陶文对于在戏剧史上具有更大影响的布莱希特多有攻击，对于布氏在剧作中体现的布氏表演体系——这一体系中有着我国古典戏曲表现手法的影响，以及他所主张的“间离效果”，叙述性特点等均惜未深论。

张健的《中西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歧异现象》一文以比较文

学的方法寻找出中国古代小说及其发展中不同于西方的特质。作者的视角显然从西方来返照东方的，且不免有艺术原则的倾斜。譬如认为中国小说欠缺悲壮雄放和关心全人类命运的作品等。但这种异同比较的追求，较之单一文化传统和心理结构的封闭性研究是有某种优越性的。

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运用于文艺批评是早已存在的事实。本书所收之罗敬之的《〈聊斋志异〉的心理表现》与侯健的《〈野叟曝言〉的变态心理》都谈到了弗罗依德学说的运用。但弗氏的学说在本世纪初完成以后，虽然影响很大，怀疑的人也很多，连他的学生荣格(Carl Jung)和同事崔灵(Lioned Tielling)也提出了修正。所以在具体运用时，个人都作了某种调整和补充。正确地说，我们在这里要更多地探讨文艺心理学的运用问题，这在我们过去的理论批评中是受到排斥的。文艺创作的心理过程和读者的感应，并不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般方法所能包容和代替的，对于弗罗依德的批判，过去采取一概推倒的态度自然是不对的。文学学和心理学，前者是人文科学，后者主要是自然科学，它们所运用的方法虽然不同，但却是可以互相阐发，互相补充的两门学科。尤其是弗罗依德学说的建立，使二者进一步接近起来。对他的学说的研究和运用，目前在海峡两岸都还处在方兴未艾之势，无论对它的合理的因素和唯心的错误，肯定和批判，都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关于“新批评”，并不是单一的一种方法，它是三十年代就流行于英国的一种形式主义批评原则的总概念。运用这一方法分析作品，主张从它的内质(词汇、语言、作品形式、表现手法)着手，寻求“构成文学之成为文学的属性是什么”，被称为“文学本体论”，属于“作品自主论”。他们探讨文学独有的经验元型、构

织过程、语言和技巧，是与文学的外缘研究相对立的。这一派的主张，对于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的建立和结构主义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并在欧美盛极一时，而在六十年代进入低潮。台湾的引进，是七十年代的事，同样也曾有过争议，而批评的一方却来自大洋彼岸的华裔学者。据黄庆萱《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几个层面》(《古典文学》第一集，一九七九年台湾学生书局)介绍，其序幕是由夏威夷大学夏志清教授的一篇文章^①引起的。黄氏介绍说：

(夏氏)于赞美钱锺书《谈艺录》为“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研究生入手必备的批评宝典”之余，对于“近年来，在台湾，在美国，用新观点批评中国古典文学之风”，表示“隐忧”。这种意见，在正在台湾提倡“新批评”的颜元叔看来，何异“要把我们根基给挖掉”，于是，一篇题为《印象主义的复辟》的反击文章出现了。驳斥“传统的诗话词话都是印象主义的批评”，“失之于朦胧晦涩”。因而坚持“采撷西洋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审慎纳入或配合中国已有传统”。接着夏教授又有《劝学篇》一文，强调新批评“自命科学而显已过时”，而美国“近二十年来最感兴趣的无疑是文学家的传记”。因此，颜教授在致《亲爱的夏教授》一文中，除“新批评应否在台湾推广”之外，更提出“文学批评与文人传记对文学孰重”的论题。

八十年代初，美籍学者林毓生也对“新批评”的忽视对文学作品作者的思想研究提出尖锐的批评。(《中国人文的重建》，一九八二年九月《联合月刊》)引用“新批评”的学者是由于感到传统的文学批评过分重视创作动机、历史背景、社会影响的追索，尤其是不满于某些机械的、粗浅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因而注重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细致分析。但它的偏颇，不仅在海外，即使在台湾，也遭到许多学者的不满。譬如收在本书的杨牧的《惊识杜秋娘》一文，作者开始就说，根据“新批评”的原则，“确实

掌握到一种新方法，新标准，开发了不少前贤所未曾想象过的诗意图”，但也对它“拒绝采取外在缘附的知识”，片面强调就诗论诗表示不足取。他用考据学的方法重释《金缕衣》一诗，以示对“新批评”的一种实例性的批评。对于两种不同的批评方法，黄庆萱作了较为客观的比较。他说：“传统文学批评，如诗话词话，重视文学作品的外缘关系，例如作品与作者、时代、环境的相互关系等等，对于作品本身，则偏向直觉的感受。而新观点的批评，则把文学作品视作一种完善独立、超越时空的艺术结构，而孜孜于其内在成分的分析。于是，字质的研究，结构的研究，象征的研究，多义性的研究，便成为文学批评家兴趣所在。”美籍学者叶维廉也说这类“作品自主论”者，“因脱离了作品成形的历史因素而专注于作品内在的‘美学结构’，虽然对一篇作品里肌理组织有细致诡奇的发挥，也确曾丰富了统计式考据式的历史批评，但它反历史的结果往往导致美学根源应有认识的忽略而凝滞于表面意义的追索。所以一般近期的文艺理论，都试图综合二者，即在对作品内在美学结构阐述的同时，设法追溯其各层面的历史衍化缘由与过程”（《比较文学丛书总序》，台湾东大图书公司版）。其实传统的文学批评并不专注于作品的外缘研究，对作品本身，也并非仅仅“偏向直觉的感受”，而“新批评”派本身后来也感到其文学本体论的局限，因此象“新批评”派的大师艾略特（T.S.Eliot）自己后来也作了某些修正和补充。因不属本文要介绍的范围，这里就暂阙弗论。

以上是台湾（也涉及到了美国）对于“新批评”的认识和讨论的大略介绍。本书选录的两篇文章：黄永武的《古典诗中的具象效用》和姚一苇的《李商隐诗中的视觉意象》，可作为我们了解这一批评原则的参考。黄文从汉字的特殊结构出发并举例分析，